

九国租界与 近代天津

JIUGUOZUJIEYU
JINDAITIANJIN

尚克强◎著

天津出版界



选题策划 / 陈 华 责任编辑 / 田 昕 装帧设计 / 郭亚非

ISBN 978-7-5309-5348-8



9 787530 953488 >

定价：25.00 元

九国租界与 近代天津

尚克强◎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国租界与近代天津 / 尚克强著.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309-5348-8

I.九… II.尚… III.租界—地方史—天津市—近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3170 号

九国租界与近代天津

出 版 人 肖占鹏

作 者 尚克强

选题策划 强 华

责任编辑 田 昕

装帧设计 郭亚非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 : // www. tjeph. com. cn](http://www.tje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 (787×1092 毫米)

字 数 198 千字

印 张 11.25

定 价 25.00 元

近

代天津是一座饱受列强侵略和掠夺的城市，从1860年天津开埠到20世纪初的四十余年里，先后有英、法、美、德、日、俄、意、奥、比九国租界的建立，这在全国设有租界的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

历史是一种时空文化。由于租界的存在几乎伴随了近代天津城市成长的全部，而且在时间的流淌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履痕，因此我们若想研究或了解近代天津的历史，租界便成了一个不可能回避的问题。租界，厚厚地覆盖了天津的昨天。

租界，是国家罹难之时，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而设立的，无疑是一种政治的强加和文化的强加；可是对于天津这座几百年来一直被传统农耕社会和乡村时代包围的港口城市来说，租界还为她打开了通往近代的时间隧道，架起了走向世界的无形桥梁。近代天津的一切，似乎都曾处在租界的影子里。

人人都生活在历史的流变中，而历史流变中的韵律总是复杂而又诡谲。如何在一座城市的传统与近代互动中，表达出我们应有的价值理念？如何在历史概念与类型模式的交错中，理清我们的观点与思路？租界，仅仅是这座城市中的灰色变奏吗？尚克强的新著《九国租界与近代天津》，就是一部力图通过丰富的多元史料，细密的解说剖析，清楚的条理架构，为我们解释和解答上述问题的。

《九国租界与近代天津》所涉及的内容，大都是租界研究中的前沿性课题，其中不少问题虽为大家津津乐道，却常常为研究者所忽略。比如说，怎样为租界定性？附属于租界的“准租界”地区在天津的哪些地方？租界里的行政体制和各种制度是怎样的？租界里的各国侨民以及侨民的职业与生活情况如何？作为租界居民主体的华人，华人社会的不同群体，华人社会的底层状况又如何？中西兼容、雅俗共赏的华人社会文化是什么样子？近代天津城市建设与外来文化的传播的关系是甚么？多国色彩的历史文化街区是怎样形成的？等等，等等。历史原本是沉寂的，可是有了作者深入细致的研究和生

动脱俗观的描述，却使这部书成为了观察天津租界世间百态的窗口；在许多方面复活了那个时代的天津城市性格；让我们明白了大量的租界建筑，为什么在今天还能成为丰富文化含量的天津城市景观……拨开历史的烟霭，那些在久远年代发生的诸多历史瞬间，仿佛都变得近在咫尺。

虽说历史是昨天的记忆，但对每个人都不可或缺。当前，我们正处在解放思想，干事创业，科学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充分享受已经拥有的，努力创造希望拥有的，是我们的优长所在。在这样的进程里，我以为，一旦丢弃历史的记忆力，将无从探索城市发展的科学化与个性化道路；也无法以面对未来的气势，承接现实的挑战。

我与克强先生相识有年，知道他是一位虚心好学、豁达乐观、精力充沛的学者。尤其对天津租界的研究，一直是他的长项。克强先生虽已年近古稀，给人的感觉，是他始终有一颗奔跑的心。为了这部书，他花费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这说明，所有锲而不舍的努力，迟早都会得到报偿。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治学无他，只有持之以恒，才能为一切聪明才智打好基础。

读罢《九国租界与近代天津》也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科学研究的成果，不应是水银灯下闪烁一时的泡沫，而应是使之长久存在于学科领域，长久存在于读者心中的知识宝库。人生苦短，逝者如斯。留住时间的最佳方式，也许就是像克强先生那样，把时间变成真正具有价值的东西。

罗澍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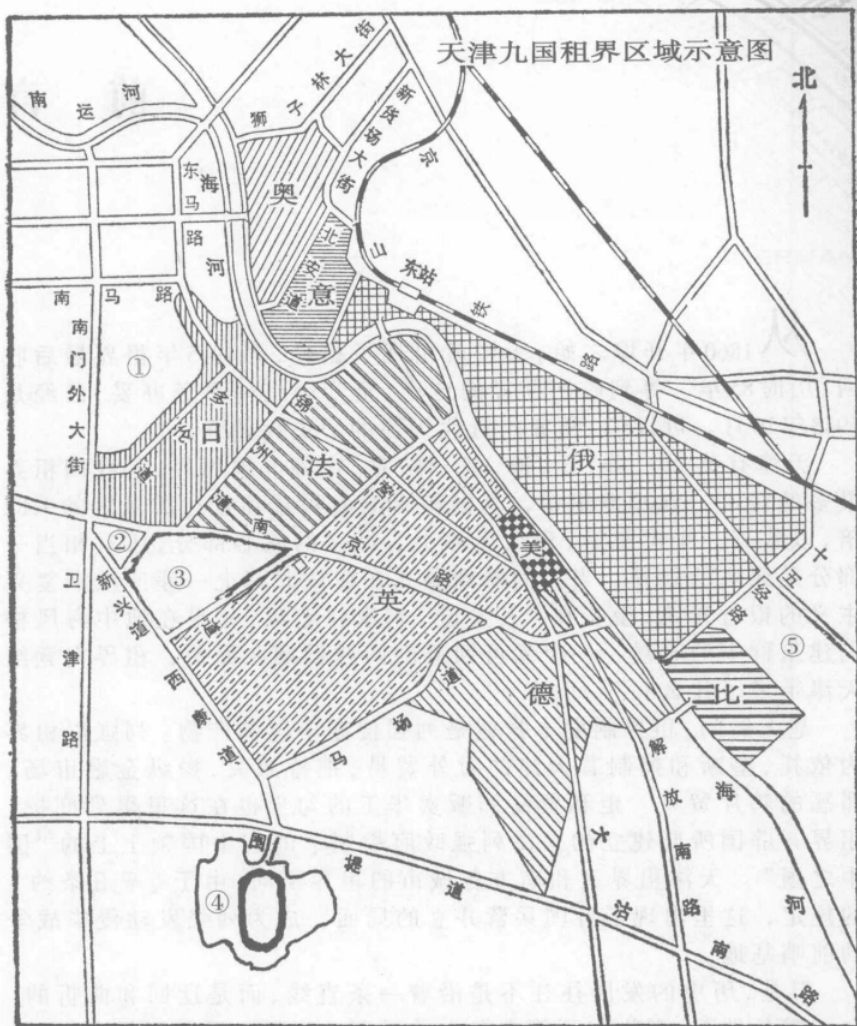
2008年7月1日晚

JAPANESE

JAPANESE

BRITISH

BELGIAN



天津九国租界区域示意图

- ①日本预留租界
- ②日租界扩张区
- ③法租界侵占区(老西开)
- ④英租界侵占区(跑马场一带)
- ⑤比利时预留租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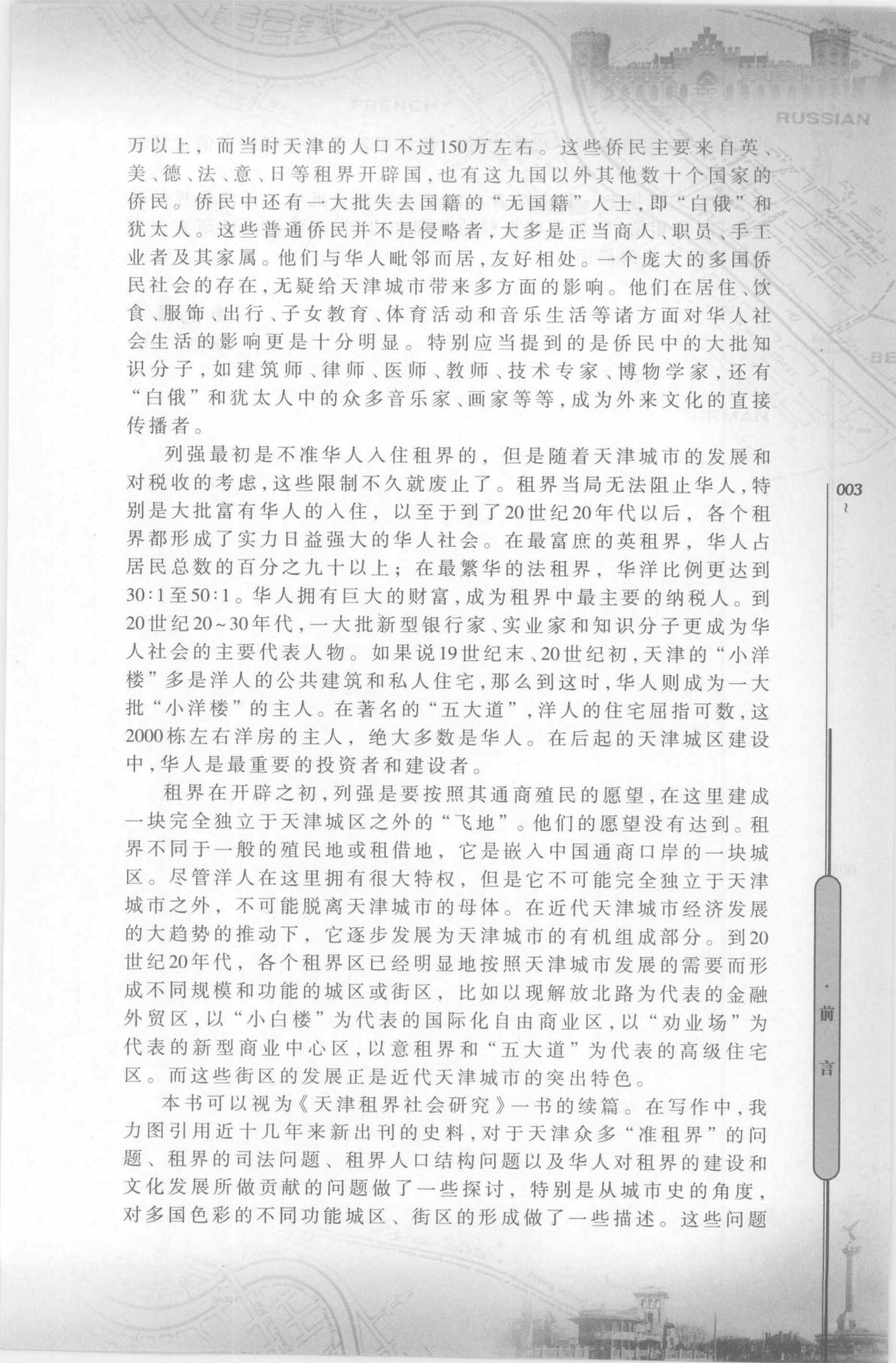
前言

从1860年开埠之始,天津就出现了租界,到1945年租界最后收回,历时85年。等到收回租界的地产、资产等具体事务办妥,已经是1948年10月。可以说,租界与近代天津的历史相始终。

天津有英、法、美、日、德、俄、奥、意、比等九国租界,是我国租界最多的城市。到20世纪初,九国租界的面积总和竟达旧城区的9.82倍,以致到一个世纪后,现在天津中心城区的核心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来的租界。当人们看到矗立在解放北路上一座座欧洲复兴主义的银行建筑,漫步在“五大道”别墅住宅区,驻足在地中海风格的建筑群中的时候,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就摆在面前:租界究竟给天津带来了什么?

毫无疑问,租界制度本身就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列强以租界为依托,垄断和控制着天津的对外贸易,把持海关,操纵金融市场。罪恶的鸦片贸易、走私贸易和贩卖华工的勾当也在这里得到庇护。租界开辟国所要建立的是由列强政府控制下的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天津租界又和南方各城市的租界不同,由于《辛丑条约》的规定,这里出现了各国兵营并立的局面,成为列强发动侵华战争的前哨基地。

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沿着一条直线,而是迂回和曲折的。在一定条件下,事物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列强在开辟租界之初,是要建立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也独立于天津旧城区之外的由洋人居住的西方城区。随着大量移民的到来,他们的官员和商人要居住,他们的传教士要布道,他们的洋行、银行要经营……。于是,先是有洋房、石碴路的出现,接着,自来水、电灯、有轨电车、开启铁桥、体育场和跑马场等等陆续出现了。租界最初的建设者无形中把西方近代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成果引进了天津。租界的存在,又为大批外国侨民进驻天津提供有利条件。特别是20世纪最初30年间,数以万计的侨民来天津居住和经商。在以后的若干年中,天津的外国侨民曾达到7



万以上，而当时天津的人口不过150万左右。这些侨民主要来自英、美、德、法、意、日等租界开辟国，也有这九国以外其他数十个国家的侨民。侨民中还有一大批失去国籍的“无国籍”人士，即“白俄”和犹太人。这些普通侨民并不是侵略者，大多是正当商人、职员、手工业者及其家属。他们与华人毗邻而居，友好相处。一个庞大的多国侨民社会的存在，无疑给天津城市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他们在居住、饮食、服饰、出行、子女教育、体育活动和音乐生活等诸方面对华人社会生活的影响更是十分明显。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侨民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如建筑师、律师、医师、教师、技术专家、博物学家，还有“白俄”和犹太人中的众多音乐家、画家等等，成为外来文化的直接传播者。

列强最初是不准华人入住租界的，但是随着天津城市的发展和
对税收的考虑，这些限制不久就废止了。租界当局无法阻止华人，特别是大批富有华人的入住，以至于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各个租界都形成了实力日益强大的华人社会。在最富庶的英租界，华人占居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最繁华的法租界，华洋比例更达到30:1至50:1。华人拥有巨大的财富，成为租界中最主要的纳税人。到20世纪20~30年代，一大批新型银行家、实业家和知识分子更成为华人社会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津的“小洋楼”多是洋人的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那么到这时，华人则成为一大批“小洋楼”的主人。在著名的“五大道”，洋人的住宅屈指可数，这2000栋左右洋房的主人，绝大多数是华人。在后起的天津城区建设中，华人是最重要的投资者和建设者。

租界在开辟之初，列强是要按照其通商殖民的愿望，在这里建成一块完全独立于天津城区之外的“飞地”。他们的愿望没有达到。租界不同于一般的殖民地或租借地，它是嵌入中国通商口岸的一块城区。尽管洋人在这里拥有很大特权，但是它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天津城市之外，不可能脱离天津城市的母体。在近代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的推动下，它逐步发展为天津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到20世纪20年代，各个租界区已经明显地按照天津城市发展的需要而形成不同规模和功能的城区或街区，比如以现解放北路为代表的金融外贸区，以“小白楼”为代表的国际化自由商业区，以“劝业场”为代表的新型商业中心区，以意租界和“五大道”为代表的高级住宅区。而这些街区的发展正是近代天津城市的突出特色。

本书可以视为《天津租界社会研究》一书的续篇。在写作中，我力图引用近十几年来新出刊的史料，对于天津众多“准租界”的问题、租界的司法问题、租界人口结构问题以及华人对租界的建设和文化发展所做贡献的问题做了一些探讨，特别是从城市史的角度，对多国色彩的不同功能城区、街区的形成做了一些描述。这些问题

的看法，肯定有许多不成熟之处，我恳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最近三四年来的，我市学者在海外发掘到大批有关天津租界的档案史料，我相信，随着这些史料的整理和出刊，天津租界的研究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尚克强

2008年7月

JAPANESE

Japanese
Barred

BRITISH

AMERICAN
COMPOUND

BELGIAN

序 / 罗澍伟

前言 / 尚克强

第一章 九国租界的划定 001

-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英、法、美租界的划定 001
- 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德租界的划定和英租界的扩张 003
- 三、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和多国租界林立局面的形成 004
- 四、附属于租界的准租界地区 009

第二章 租界的行政体制和各种制度 014

- 一、天津租界的行政体制 014
- 二、天津租界的法律制度 020
- 三、天津租界的司法问题 022
- 四、中国当局课税权的丧失 023
- 五、世界罕见的驻军制度 024

第三章 多国侨民汇集天津租界 029

- 一、多国侨民大量涌进天津租界 029
- 二、以商人为主体的英、美等国侨民 032
- 三、日本侨民的急剧增加 036
- 四、白俄和白俄社会 038
- 五、建构完整社区的犹太人 040

第四章 日益壮大的华人社会 042

- 一、华人是各租界居民的主体 042
- 二、买办的形成及其向近代工商业者的转化 045
- 三、北洋寓公的入住 048
- 四、新型银行家、实业家群体 057
- 五、容易被忽略的社会底层 066

第五章 天津租界是列强侵略我国的重要基地 069

- 一、垄断和控制天津的对外贸易 069
- 二、把持天津海关 071
- 三、操纵金融市场 072
- 四、投资房地产获取暴利 073
- 五、鸦片贸易、走私贸易和贩卖华工 076

六、列强历次发动侵华战争的前哨基地 078

第六章 近代城市建设和外来文化的传播 081

- 一、近代城市建设的开展 081
- 二、“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形成 086
- 三、近代教育制度的输入 088
- 四、近代科学和文化艺术的传播 092
- 五、近代体育项目的引进 095

第七章 中西兼容、雅俗共赏的华人社会文化 099

- 一、摩登的天津 099
- 二、华人兴办新式学校成绩斐然 102
- 三、收藏大家的涌现和京剧艺术在天津的发展 105
- 四、以曲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繁荣 109

第八章 多国色彩的历史文化街区的形成 112

- 一、我国北方最大的金融、外资中心——现解放北路 112
- 二、洋味十足的自由商业区——“小白楼” 127
- 三、马可·波罗广场的建设与意式建筑群的形成 134
- 四、新型的城市商业、娱乐业中心——劝业场地区 140
- 五、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的形成 146

第九章 天津租界的收回 160

-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奥、俄租界的收回 160
- 二、经过谈判收回的比利时租界 162
- 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天津日、意、英、法租界的收回 162

引用书目 165

后记 / 尚克强 167

第一章 | 九国租界的划定

从1860到1903年的43年中,天津外国租界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列强每一次掀起强占租界的狂潮,无不是借助于侵华战争的余威,逼迫清政府节节退让,以致使天津出现了九国租界,成为全国租界最多的城市。除了划定租界,列强还用各种方法划定“预备租界”,并且越界抢占土地、占领界外“飞地”、越界筑路等,进而扩张租界。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英、法、美租界的划定

天津地处河海要冲,因驻兵而置卫,因漕运而兴商,到清代中叶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自西方列强自海上东进,天津更成为首都北京的门户。早在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之前,就拟定了先打到天津以要挟北京的战略。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英、法更看准了天津的重要地位,1858、1859、1860年三次集重兵于大沽口,都是以占领天津,进而攻打北京为目的。

1860年10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两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这个条约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同年11月,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F. W. Bruce)就急忙派遣参赞巴夏礼(H. S. Parkes)等人到天津择定英租界的界址。此时,英法联军尚有7000余人驻扎在海河两岸,现天津中心城区完全在英法联军控制之下。11月24日,巴夏礼“在津城东南相距五六里之紫竹林起至下园上,勘丈空地”,“预备明年来津盖造房屋之用”。^①对于此事,当时在天津办理交涉的崇厚竟没有看出其中的玄机,认为既然条约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现在英国人的行动,当无大碍。他甚至认为,现在外国军队占据着许多城区的衙署、民房,倘若他们自己另外租地建房,“即可令其将民房让出,民无滋扰,庶得两

^① 天津档案馆等:《天津租界档案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页(以下引用此书,只注书名及页数)。

无妨碍”。^① 12月4日,卜鲁斯向恭亲王递交了照会,其中提出:“本大臣意将津地一区代国永租,为造天津领事官署并各英商来津起盖住屋、栈房等所用。”^②同时提出,对于界内民田、民居以每亩30两银为租地正价,外加银10两为赔补迁移费,对于原有房屋及基址另议明赔项。并请转咨直隶总督,飭地方官办理。总理衙门在奏报咸丰皇帝时还说明,据天津地方官调查,在这块地界内只有零星土房,并无坟墓窒碍之处,建议与英国人“妥为商办”以期地方相安。他们认为,英国人“系照条约办理,自未便拂其所请”。^③事实上,在有关的条约中,根本没有“永租”的规定,更没有日后划定租界的条文。所以,天津英租界的开辟,只凭一纸照会,并没有任何条款协议和手续。

不久,英国首任驻津领事孟甘(J. Mongon)又将所划定的土地重新丈量一遍,最后确定了英租界的四至是:自紫竹林起至大井庄长31.5丈;自紫竹林沿河起至海大道宽115丈;又自大井庄河沿起至海大道宽71丈,面积共计489.025亩。^④对照现在的市区街道,即东至海河,西至大沽路,北至营口道与法租界交界,南至彰德道与美租界交界。他们在四至地边各钉一根石柱,上书“大英看定地基”六个汉字。^⑤当时,这一带只有一些零星的工房,多是菜地和坑洼地。租界划定后,英方即由参与划分的皇家工兵上尉戈登(C. G. Gordon)做了初步规划。戈登初步规划了主要道路的走向,把不同街区、地段标号,以备“出租”。

当英国人为划分租界而奔走时,法国还没有派驻领事,不过,法国人也一直在关注着租界的划分。戈登在测量规划的时候,一名法国工兵军官也在参与。据天津知府石赞清禀报总理衙门,英国所划定的地界“自用地七成,分给法国地三成”。^⑥随后,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M. A. KleczKowsKi)来到天津,亲自对法租界进行勘定,并取得了清政府的认可。1861年6月2日,哥士耆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签订了《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当时划定的法租界四至是:南界为今营口道与英租界接壤,西至今大沽路以东,东、北面傍海河,占地面积439亩。

1860~1861年划定的英、法租界正处于天津城外的一座寺庙——紫竹林一带,因此这里被称为“紫竹林租界”。天津租界后来几经扩张,但是这里始终是天津租界的核心地带,大多数外国银行、洋行全集中在这一地区,不仅英、法的领事馆、工部局、公议会设在这一带,连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日本(早期)领事馆也设在这里。



穿上中国服装的戈登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天津租界档案史料选》,《历史档案》1984年第1期,第29页(以下引用此文,只注标题及页数)。

② 《天津租界档案选编》,第5页。

③ 《天津租界档案选编》,第6页。

④⑤⑥ [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四国新档·英国档》,第567页(以下引用此书只注书名及页数)。

在天津的各国租界中,唯有美租界的划分不是战争的直接产物。不过,它也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划分租界的大势下出现的。关于天津美租界划定的时间和划分过程,目前学术界说法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见到有关记载的权威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比较可信的分析是,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是1861年10月26日被任命的,翌年7月20日才抵达北京。美国第一位驻天津领事佛弼师是1862年任命,同年3月30日照会崇厚宣布到任。按照一般情况,在这两位官员到任前,美国租界不可能正式划定。因此,美租界的划定起码是1862年4月或以后的事。^① 美租界的四至范围是:东临海河;西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南到现开封道;北与英租界交界(今彰德道),面积为131亩。美租界在设立后名义上由美国驻津领事管辖。由于这时正值美国国内的南北战争,来津的美国商人极少,再加上美国政府倾向于设立公共租界,因此,天津美租界一直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所以,这里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德租界的划定和英租界的扩张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壮大起来,侵占朝鲜和中国是日本执政党处心积虑的战略方针。1894年日本悍然发动中日甲午战争。腐败的清军在陆战、海战中屡战屡败,1895年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取得了割让中国领土台湾和辽东半岛以及巨额赔款的利益。一个新起的东方小国获利如此之丰,这激起了西方各国吞噬中国的欲望,在19世纪最后的几年中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强在天津的租界在这个狂潮中急遽扩张。

先是德国向天津伸手。德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出面联合俄、英干涉日本吞并辽东半岛,最后达到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的结果,这就是“三国干涉还辽”。从此,德国以有功于中国的身份大肆向清政府索取特权。它不仅强租胶州湾,而且效法英、法,要求在汉口、天津开辟租界。清政府为了表示对德国的感激之情,马上同意了这一要求。直隶总督王文韶饬派的天津道任之骅、海关道李岷琛与德国驻天津领事司艮德(B. E. Von SecKendorff)于1895年10月30日签订了《德国租界设立合同》,^②允许德国“永远在天津设立租界”。合同规定了德国租界的四至范围:北界今开封道与美租界接壤,东临海河;西至今大沽路;南至今琼州道,占地面积1034亩。条约中对于界内土地问题的规定比英、法当年的更为强硬:界内的会馆、义地、道路、空地等“系中国国家之地,丈量多寡,中国允将此地让德国租界,无庸给银”。而界内私人土地由德国领事按每亩75两白银的价格支付地价,以后每年德国工部局付给中国政府每亩土地年租1000文。德国当局要求原地产主自付地价银之日起,三个月内交出土地,迁出租界。对于不肯售卖房地居民,要由中国官员“劝令售卖”。

表面上看,德国租界当局支付的地价每亩75两白银比当年英租界的30两要

①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32页(以下引用此书只注书名及页数)。

② 《天津租界档案选编》,第161~165页。

高出不少。但是事隔35年,土地价格在迅速上涨,界内居民当然不肯出让土地,而德国方面又坚持原价。这时,时任直隶总督的裕禄为了平息事端,竟然决定由中国官方出面,按界内居民土地房屋的不同等级给予补贴。最后,这类补贴竟然达到了白银12万两,其数额已经超过了德国为开辟该界所支付的全部房地价。裕禄为此特向朝廷上奏:“万分支绌,请由部拨银十二万两,作为办理德国租界之用。”^①

天津日本租界的划定经历了较复杂的外交谈判。这主要是日本以战胜国的身份相威胁,而清政府在刚刚签过《马关条约》之后,背着极大的骂名,不敢贸然答应日本的条件。所以,中日双方基于日本在华设立租界问题的谈判,持续了一年多。最后,清政府还是难以招架,中日于1896年10月19日签订了《公立文凭》,允许日本在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处设立专管租界。1898年8月29日,天津海关道李珣琛、天津道任之骅与日本驻津领事郑永昌签订了《日本租界条款》和《另立文凭》,^②规定了日租界的四至范围是:东北界沿海河;东南界不与法租界交界,相隔一段距离,从海河边向西划一直线,至土围墙(此界后修成蓬莱街,即今沈阳道);南界沿土围墙至海光寺;西北界因要让开现有道路和海光寺,故呈折线状,从海光寺南土围墙至海河边北横街上(此界后修成福岛街,即今多伦道),面积共计1667亩。另外,他们又要求清政府将日租界西北界外的一片土地划做“预备租界”,同时,又在海河下游德租界以南的小刘庄一带,沿河划出一段空地,为日本轮船停泊码头,占地约100亩。日本租界整体上处于天津城东南,紫竹林租界西北地区。这里与英、法、美、德租界一样,拥有濒临海河的航运优势,而且是各个租界最靠近中国政府管界的区位。

1895年底划定界址的德租界(1034亩),其面积竟然是最早开辟的英租界(489亩)的两倍以上,这使得英国拓展租界的愿望更加迫切,于是以“洋行日多,侨民日众,租界不敷应用”为由,向清政府提出扩展租界的要求。实际上,英国早已悄悄地越过租界的西界(现大沽路),以各种名义租占了800余亩土地并建造了不少房屋,清政府只得答应他们的要求,即租界西界向西南方向扩展。1897年,中英双方签订了《新议英拓展租界章程》,扩展的具体范围是:从海大道(现大沽路)向西南扩展至土围墙(现南京路);西北界为与法租界交界的延长线(现营口道),全界成三角状,占地面积1630亩。至此,英租界的面积已经增至约2119亩。

三、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和多国租界林立局面的形成

1900年,由英、法、俄、日、美、德、意、奥等列强组成的八国联军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场侵华战争。列强的直接目标就是攻占京津。6月17日,大沽炮台陷落;7月14日,天津城陷落。紧接着,八国联军划出不同的地界,对天津城及其附近地区实行分区军事占领。从1900年夏天到1902年一年半的时间里,中

^① 《天津租界档案选编》,第165页。

^② 《天津租界档案选编》,第191~194页。

国政府完全失去了对天津的控制。1900年7月22日,联军在天津建立了“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Tients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对天津实行了完全的殖民统治,这正好为日后占领和扩展租界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在这期间,不仅在天津没有设立租界的俄、意、奥大都把各自军队占领的城区强行划定为各自的租界,根本未出兵的比利时也趁火打劫,强占租界。而原来已经设立租界的英、法、德、日各国更是纷纷借机扩展。在20世纪最初的一两年中,被抢占和扩展的租界面积达到16600亩,占最后形成天津租界面积的三分之二。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时间最集中、规模最大、参与国别最多的一次租界大扩张。

首先提出设立租界的是俄国。俄军是进攻天津城的主力之一,尤其是在老龙头车站(即现天津站)一带多次与义和团发生激战。这时,俄国以胜利者、征服者的姿态提出,对它占领的海河东岸的大片土地“保留绝对的主权”,^①要求建立租界。于是,俄国公使格尔斯(M. N. de Giers)在北京与清政府任命的议和大臣李鸿章专为此事谈判。李鸿章为了笼络俄国,以利议和,转请朝廷允准俄国在天津设立租界:“臣查各国在天津均有租界,俄商独无,论理本觉偏枯。今既来就范围,以礼乞请,自应允许,使彼心向我益坚。”^②朝廷随即批准。1900年12月31日,中俄双方在北京草签了《天津租界条款》。1901年5月,天津河间道张莲芬、直隶候补道钱镛与俄国领事珀珮(N. M. Poppe)签订了《天津俄租界合同》,正式划定俄租界。由于俄国将车站也划入租界,这引起了英国的反对,英、俄军队还为此发生了冲突,最后由德、美两国出面调停,俄国做出让步,同意将车站及站前大街划出租界,仍归中国政府管辖,因此,形成了俄租界的东、西两区。其四至范围是:西区西界今五马路,东至车站,南临海河,北至铁道;东区从海河转弯处向南,北起车站向东沿铁道南侧,西临海河至十五经路。面积总计5474亩。俄租界不仅地处车站两侧,而且位于铁路和海河之间,从日后发展储运业来说,占有非常方便的条件。

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俄国一样,也是先有军事占领,然后转为租界。意大利军队在攻打天津战役之后占领了俄租界以西、海河北岸的一片土地。1900年12月,该国驻华公使萨尔云葛(M. G. SalvagoRnagi)宣称:为了有效地保护意大利人商业和航运方面的利益,意大利政府准备在天津开设领事馆,并与其他国家一样在天津设立租界。由于意军占领地区的北部是人口较多的居民区,而河边更有明代以来的盐坨100余条,迁移起来难题很多,李鸿章坚持请意方另辟一处。由于意方坚持此地,双方谈判持续了七个月之久,直至李鸿章病故。在意方的威吓下,1902年6月1日天津海关道唐绍仪



俄国领事馆(今大光明桥东)

① 《天津海关1892~1901年十年调查报告》,《天津历史资料》第4期,第88页。

② 《天津租界档案选编》,第325页。